

20世纪以来刘禹锡思想、文学研究述论

洪迎华¹ 尚永亮²

(1.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361005; 2.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从思想心态、文学创作方面对20世纪以来的刘禹锡研究予以全面的总结、归纳。思想心态研究以进入80年代为界,分为前后两大时段。之前偏重于对其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的探讨,之后则趋向全方位和多元化考察。文学创作研究前六十年间成果较少,80年代后才回归文学本位,进行了热烈和宏、微兼具的探索。

关键词:刘禹锡;20世纪;思想心态;文学创作

中图分类号:I 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2X(2010)04-0060-05

20世纪以来的刘禹锡研究,一方面集中于对刘氏生平、作品及文集的文献学考索,^①一方面表现在对刘禹锡思想心态及文学创作的深入考察。而相比之下,后者所占比重更大,也更为引人注目。兹依据史料,从思想心态和文学创作两大方面作一述论,希望能对此后的刘禹锡研究有所裨益。

一、思想心态研究

刘禹锡不仅是一位文学家,还是一位思想家。百余年的刘禹锡研究中,其思想一直是关注的热点,研究成果达100多项。以进入20世纪80年代为界,可分前后两大时段。之前偏重于对其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的探讨,之后则趋向全方位和多元化的考察。

80年代前对其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时代文化、政治思潮的影响。五六十年代,哲学界唯物主义思潮盛行,报刊上出现了若干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探讨其无神论思想及贡献的文章,如赵纪彬《刘禹锡和柳宗元无神论思想研究》(《哲学研究》1957年第5期)、炳然《对刘禹锡、柳宗元在无神论史上的新估价》(《光明日报》1957年11月21日)、肖蕙父《关于刘禹锡的“天与人交相胜”的学说》(《江汉学报》1962年第7期)、游钦赐《柳宗元、刘禹锡的哲学思想》(《学习与研究》1958年第1期)等。文革早期,研究成果罕见。而到了1974、1975这两年,由于受“评法批儒”运动的影响,对刘禹锡的关注热情急剧升温,除了继续探究其唯物论、无神论思想外,还涌现了一大批从“评法批儒”的角度探求刘禹锡法家思想的文章,如闻军《论刘禹锡的政治诗》(《北京大学学报》1974年第6期)、苏者聪《论刘禹锡诗歌中的

法家思想》(《武汉文艺》1975年第1期)、萧涤非《唐代法家诗人刘禹锡》(《文史哲》1975年第1期)、金学迅《坚持革新反对倒退的诗人——法家刘禹锡的诗歌读后》(《天津文艺》1975年第1期)等。据不完全统计,各类文章近50篇。因政治气候带动而刮起的这股“刘禹锡风”,虽在客观上极大强化了其人其作在社会上的普及度,但研究成果重复、目标单一、范围狭窄,严重导致了学术研究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

文革后,随着思想禁锢的破除,学术视野逐渐打开,对刘禹锡思想的认识开始走向全面、多元和客观。

首先,在传统研究领域即哲学、社会政治思想上,一方面,沿袭传统视点,对其唯物论、无神论、法制思想等的讨论仍在继续深入,如王应常《论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观》(《南宁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纪作亮《试论刘禹锡的宇宙观》(《学术界》1989年第5期)、周肇光《论刘禹锡的法制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政法论坛》2000年第1期)等。但相较之下,这一时期的讨论不仅更为辩证、理性和客观,还摄取了一些新的角度和观念。如谭家健《略谈刘禹锡的时空观》(《河南师大学报》1979年第5期)一文从自然科学的立场分析其时空观念,刘鄂培《中国古代天人观的发展与柳宗元、刘禹锡论自然与人的关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1999年第2期)一文从刘禹锡对自然与人关系的理解中寻求解决人类生态、环境、道德等问题,黄岩《试论刘禹锡的生态伦理观及其当代价值》(《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一文基于人类的生态环境危机,探讨刘禹锡“天与人交相胜,还相用”中蕴涵的生态伦理思想及对维护生态平衡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皆让人耳目一新,赋予了刘禹锡哲学思想新的时代内涵

收稿日期:2010-05-30

作者简介:洪迎华(1976-),女,土家族,湖北长阳人,厦门大学中文系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唐宋文学。

尚永亮(1956-),男,河南长垣人,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参见洪迎华、尚永亮《20世纪以来刘禹锡研究综述——以生平、作品及文集的文献学考索为中心》,《文献》,2009年第2期。

©1994-201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和意义。另一方面,新的研究点也逐渐被发现和关注,使得研究呈现出多元化格局。如申志钧《试论刘禹锡在我国医学上的贡献》(《福建中医药》1983年第3期)、吴兆华《试谈刘禹锡的医学哲学思想》(《中山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刘朝谦《人生乐园与自然之美——刘禹锡自然美论兼议》(《四川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等,皆从新的角度对刘禹锡丰富的哲学和社会思想内涵进行探讨,拓展了研究空间。

其次,学界将目光更多转向新的思想研究领域,成果斐然。探讨主要围绕两大议题:

一是刘禹锡与宗教的关系。这方面主要集中于对刘禹锡与佛教关系的探讨。刘禹锡“事佛而佞”,佛学在其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对此,早期的研究中也曾有人注意到。如20世纪30年代子葵在《刘禹锡》一文中谈及刘禹锡的哲学思想时说:“唐代思想,凝塞固滞;如韩柳等儒家,韩昌黎之思想为乐天,柳宗元之思想为厌世,而刘禹锡之思想则介乎二者之间。一方面对于社会朝政,评论深刻,因而屡被贬斥。一方面受佛教思想之陶融,间有如王维、孟浩然之作品,含有佛教之精神。”其中指出了佛教思想对刘禹锡的影响,然只是点到为止,未能展开和深入。此后,刘禹锡被划入唯物主义阵营,这方面的研究自然中断。文革后较早对此深入关注、引风气之先的是1978年陈允吉《论刘禹锡及其文学成就》^①一文。文章对刘禹锡与儒释道三家的关系作了全面分析,并着重指出了刘禹锡的思想观念、文学创作与禅宗的密切关系,及其“天人交相胜”理论与宗教观念之间的紧密联系。80年代后,相继出现了多篇论文专门探讨,如萧瑞峰《论刘禹锡诗中的佛教烙印》(《贵州文史丛刊》1986年第3期)、张碧波《论刘禹锡和佛教禅宗》(《学术交流》1988年第6期)、杨鸿雁《刘禹锡与佛教》(《贵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龚玉兰《刘禹锡“事佛而佞”心态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王树海《佛禅与刘禹锡的人情诗性》(《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6期)等。这些成果从刘禹锡事佛的原因、过程、特点、典型意义及其对文学活动的影响等多方面展开论述,各有偏重,共同推进了对刘禹锡与佛教关系这一主题的研究。其中不乏歧见,如关于刘禹锡崇佛的原因,杨文认为:刘禹锡与佛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客观上是因为佛教已经发展到了与儒、道鼎立而三的兴盛时期,身处其时的刘禹锡幼时就与诗僧有融洽的师生关系;主观上,遭受了种种打击后,他愿意接近佛教。僧人成了沟通刘禹锡与佛教的桥梁。而龚文则认为:刘禹锡是受到了历史和时代风气的熏染,才产生了精研佛理、结交禅僧等一系列与佛教有关的活动的,他的这种态度是对当时流行的禅宗的社会作用的思考和研究,而不是个

人受挫的结果。也有讨论得较为集中和深入的问题,如佛禅与刘禹锡诗论之关系,除以上数文涉及外,高林广《佛禅美学与刘禹锡的诗学思想》(《内蒙古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龚玉兰《刘禹锡的文学理论与禅之关系》(《广西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诸文也对此专门探讨,指出刘禹锡诗论中虚静成诗、境生于象外及对自然清丽风格的崇尚等思想观点,皆受到佛禅美学的影响。此外,还有研究者注意到刘禹锡与道教之间的关系,如孙琴安《刘禹锡诗中所涉及的道教》(《上海道教》1991年第3期)、张思齐《从刘禹锡诗看中唐道教的升降变迁》(《宗教学研究》1999年第1期),均不无开拓的价值和意义。

二是刘禹锡的文学思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分两类:一类立足于总体文学观,论述刘禹锡对文学与政治、文学与时代、文学独创性及辞采形式等方面的看法,如刘国盈《论刘禹锡的文艺思想》(《天津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陈绪万《刘禹锡文学观初探》(《人文杂志》1990年第5期)、刘欢《论刘禹锡的文学思想》(《延安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等。另一类则集中关注刘禹锡的诗学思想,如孙琴安《刘禹锡的诗歌理论》(《镇江师专学报》1986年第2期)、萧瑞峰《刘禹锡诗论初探》(《杭州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赵晓岚《刘禹锡诗论新探》(《求索》1994年第2期)等。其中以萧文和赵文较为精详。萧文着重论述了刘禹锡诗论中的三个层面:一是刘禹锡对艺术构思的真知灼见,如重视想像的作用、强调以意为主等;二是刘禹锡对诗歌语言的丰富论述,如要求诗歌语言含蓄精练、清丽、自然浑成、须有来处、以比兴出之、依于声律等;三是刘禹锡对学习与创新的关系认识。赵文的论述也从三个方面展开,即强调诗歌“义得而言丧”、“境生于象外”的审美特质;提出因定得境、虚静成诗的创作论;提倡天然邃美、静而味长的诗风。并认为:刘禹锡的诗论从意境构造、创作心态、审美风格方面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其最大价值在于对诗歌审美特质的阐述,对诗歌境界的明确规定,以及对创作心态的描述;其诗论自成体系,在唐代诗论史乃至中国诗论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和承前启后的地位。两文各有偏重,又互有贯通,以深刻的见解推动了对刘禹锡诗学思想的认识和讨论。另外,刘欢《刘禹锡意境理论新探》(《西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朱学东《象外形无迹寰中影有迁——论刘禹锡意境理论的构建》(《南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两文聚焦于刘禹锡在意境论史上的贡献和地位,王运熙《刘禹锡的文学批评》(《殷都学刊》1992年第2期)探讨刘禹锡对同时其他作家创作的批评态度,陈允锋《论刘禹锡的地理意识及其诗学思想特点》(《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从刘禹锡对地理历史沿革、地域民风及地方歌谣充分重视的角度,探究其诗

^①《文艺论丛》第2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版。

学思想特点,皆具有掘深、补足、开新意义。

刘禹锡历经七朝,人生阅历丰厚、曲折不平,除了其思想的丰富和深邃,他独特的心路历程、不凡的人格精神也吸引了研究者的关注。如尚永亮在其《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及《论柳宗元、刘禹锡执着意识的三大特征》(《河北师大学报》1993年第7期)、《雄直劲健:刘禹锡诗文的风格主调》(《中州学刊》1991年4期)等一系列论著中,从贬谪文学与贬谪文化的角度,将刘禹锡置于元和五大贬谪诗人这一特殊群体中,详细剖析了其政治悲剧、生命沉沦和心理苦闷及由此衍生的极具典型意义的执着意识,展示了其行健不息的生命意志和劲健雄风。之后,有若干论文聚焦于此,如贺秀明《坚贞·愤懑·豁达——刘禹锡朗州时期心态探析》(《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邵之茜《论刘禹锡的人格精神》(西北大学2001年硕士学位论文)、万伯江《刘禹锡的贬谪心路探析》(北京语言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等,立足作品,对其人格内涵和心路历程进行体味和探究。特别是一系列论其“诗豪”品格的文章,如刘梦初《论刘禹锡贬谪中“诗豪”品格》(《常德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陆坚《“精华不衰”的诗豪刘禹锡》(《文史知识》1985年第8期)等,更彰显了刘禹锡英迈之气老而不衰的精神品质和人格魅力。这样的研究,立足于人学和心学,兼采传统研究方法和当代哲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理论思维的长处,以揭示其生存方式、心态变化及生命意志为归宿,不仅对深层次地了解刘禹锡其人其作,乃至对正确把握文学的特质及其与人生苦难的关系,都是不无意义的。

二、文学创作研究

20世纪以来对刘禹锡的创作研究中以诗歌研究最为突出,成果近400项,超过了研究总量的一半。从时段分布看,前六七十年间成果较少,虽有若干文章分析其名篇如《西塞山怀古》、《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等,亦大多以探讨思想为指归。80年代后,学界的研究回归文学本体,对刘诗进行了热烈和宏、微兼具的探索。

宏观而系统的研究主要见于对其诗歌艺术、渊源、体式等的探讨上。80年代中期,萧瑞峰先后发表了《论刘禹锡诗的艺术风格》(《中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1期)、《论刘禹锡诗的个性特征》(《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论刘禹锡诗的历史地位》(《吉林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等系列论文,而后汇集为专著《刘禹锡诗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9月),从创作道路、创作内容、艺术风格、创作特点、历史地位及影响等方面对刘诗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认为在韩孟、元白两大诗派叱咤风云之中唐时期,刘

禹锡不仅有卓然自立的艺术品格,还在对题材领域的拓展与发掘、对传统主题的深化与反拨、对诗歌体式的变革与完善三个方面对唐诗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也正是奠定其历史地位的三块基石。该书体系严密,论述精辟,有深度,亦有广度。此外,陈友琴《略谈刘禹锡及其诗歌创作》(《文学遗产》1981年第1期)、吴汝煜《谈刘禹锡诗歌的艺术美》(《文学评论》1983年第3期)、尚永亮《雄直劲健:刘禹锡诗文的风格主调》(《中州学刊》1991年4期)、许总《雄豪之概与清峻之美——刘禹锡诗论》(《苏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等文对刘禹锡诗歌艺术风格的论述亦具新意和见地。还有研究者着眼于刘禹锡与前后世诗人之间的承接关系,进行不同层面的考索,展现出一种史的眼光。如吴汝煜《论刘禹锡诗歌的艺术渊源》(《南开学报》1985年第1期)一文,认为刘禹锡的诗歌主要接受了《诗经》“国风”、屈原楚辞和杜甫诗歌的影响,同时远绍近取、多方承益。之后如尚永亮《人生困境中的执着与超越——从对屈、贾、陶的接受态度看中唐贬谪诗人心态》(《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4期)、何念龙《萧条异代接武前贤——论刘禹锡对屈原的继承》(《江汉论坛》1991年第7期)、刘梦初《试论刘禹锡接受屈骚的契机与必然》(《求索》2004年第6期)三文,皆从接受学角度考察了刘禹锡与屈原精神的关联,并对其作品内容和艺术特点加以讨论,颇具深度。探讨刘禹锡与后世作家关系的文章,如卞孝萱系列论文《刘禹锡与晚唐诗人》(《河北师大学报》1983年第3期)、《刘禹锡与江西诗派》^①、《刘禹锡与苏轼》(《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3辑,1985年版),吴汝煜《刘禹锡对苏轼的影响》(《光明日报》1984年8月7日)、《谈刘禹锡诗歌的影响》(《徐州师院学报》1985年第1期)等,以个案分析的方式,具体而微地呈现了刘诗的影响和诗史地位。此外,刘禹锡诗歌“无体不备,蔚为大家”,亦有论者聚焦于其诗歌体的艺术特点和成就,如宋心昌《刘禹锡的七绝论评》(《中州学刊》1992年第2期)、李师贞《刘禹锡五绝四面观》(《中文自学指导》1990年第9期)、孙琴安《论刘禹锡的五律》(《铁道师院学报》1999年第3期)、杨静《试论刘禹锡的七律》(首都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宋心昌《论刘禹锡的古体诗》(《广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1期)等,分别对其绝、律、古诸体展开考察,从文体的角度对刘诗研究予以掘进和深化。

刘禹锡诗歌内容丰富多彩,在多种题材类型上都有创获,所以对其题材的分类研究和具体探讨成为百年来研究的一大重镇。其中,以《竹枝词》、《踏歌词》、《浪淘沙词》等为代表的乐府诗研究成果最为可观。前期的研究一般把其定位为民歌体,从刘禹锡对民歌的吸收和创新、将文人诗与民歌相结合的角度去讨论,或者探讨此类诗歌

^①霍松林主编:《全国唐诗讨论会论文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与民歌的关系及艺术特点,如李申《刘禹锡与民歌》(《文艺论丛》第12辑,1981年版)、方心棣《刘禹锡民歌体诗艺术初探》(《安徽师大学报》1982年第2期)、萧瑞峰《论刘禹锡的民歌体乐府诗》(《杭州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或者对其名作《竹枝词》进行专案分析,如陈思和《试论刘禹锡的〈竹枝词〉》(《复旦学报》1981年第2期)、蔡起福《凄苦竹枝》(《文学遗产》1981年第4期)、邓小军《刘禹锡〈竹枝词〉、〈踏歌词〉研究》(《安徽师大学报》1983年第4期)、孙琴安《刘禹锡〈竹枝词〉的音调、形式、内容和影响》(《民间文艺集刊》第五辑,1984年)等,深入探讨刘禹锡《竹枝词》的特点和创作成就,以此管窥其民歌体诗创作的艺术突破和贡献。而进入90年代后,不仅对民歌体诗尤其是《竹枝词》的研究更为深入、细致,还出现了新的研究视角。一是将此类诗歌和民俗文化结合起来,探讨其民俗学、文化学意义。如吴在庆《略谈刘禹锡笔下的土风民俗》(《东北师大学报》1997年第3期)、刘欢《论刘禹锡的民风民俗诗》(《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李彤《刘禹锡诗的风物民俗钩沉》(《重庆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等。二是跳出原来民歌体诗的局限,从乐府诗的角度对其作品进行整理和检讨。如孙明慧《论刘禹锡的乐府诗》(中央民族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王琳《刘禹锡乐府诗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张煜《刘禹锡的新乐府观及新乐府创作》(《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不仅在《刘禹锡集》“乐府”卷的基础上对其乐府诗重新整理归类,还从“乐府”这一概念出发,对其体制、创作背景、艺术特点及与其它诗人乐府诗的区别进行了考察。

除了乐府诗,刘禹锡在中唐独占鳌头的咏史怀古诗亦引起关注。不仅有大量的名篇赏析文章,而且对其有较为系统和深入的探讨。或论其咏史怀古诗在思想内容和艺术上对前人的突破和建树,如萧瑞峰《论刘禹锡的咏史诗》(《贵州文史丛刊》1984年第2期)、林心治《刘禹锡咏史怀古诗新探》(《渝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或探讨其咏史诗创作的丰富内蕴及发展变化,予以分期和分类,如尚永亮《刘禹锡咏史怀古诗的类型和特点》(《东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江枰《论刘禹锡咏史诗前后期内容上的差异及成因》(《兰州学刊》2004年第4期);或讨论其咏史诗的生成因素及影响,如刘欢《刘禹锡怀古诗探析》(《唐都学刊》1998年第1期)、王丽芳《刘禹锡咏史诗的生成和影响》(东北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这些成果从咏史诗的角度确立了刘禹锡在唐代诗歌史上的地位,研究达到了一定的深度。此外,刘禹锡的酬赠唱和诗、政治讽喻诗也颇受瞩目。唱和诗的研究始于80年代后对其与白居易、柳宗元之间酬唱诗的关注。刘、白唱和在中晚唐甚为知名,且曾结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虽不多,但已有空间开拓的气象,如吴汝煜《读刘禹锡与白居易晚年的酬唱诗》

(《光明日报》1984年4月17日)、熊飞《刘禹锡、白居易唱和诗简论》(《湖北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王玫《刘禹锡白居易唱和诗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等。还需一提的是从60年代开始学界对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诗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一联理解的争议。20世纪以来此方面的文章不少,因为对这两句诗所体现出来的情绪理解不同,乃至对全诗的基调和主题也存有不同看法。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认为这两句揭露了客观事物新陈代谢、发展变化的规律,表达了诗人达观开朗、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因而全诗的基调是高昂的;一是认为其并非描写美好景象,而是表达了作者对他人得志我独坎坷的伤感,全诗的情绪是低沉的;还有人认为其中透露了一种人事不齐、自安其命的“安命”情绪,或认为句中表达了对自己身世的不平、对当朝者的愤慨和讥刺,等等。这种多义的解读,无疑从读者接受的角度大大丰富了作品的内涵。与刘、白晚年的诗酒唱和相比,刘、柳之间的酬唱主要发生于被贬之后,用于倾诉和缅怀,作品也不多,所以研究者的目的也重在探讨二人之间的交谊,如陈琼光《中唐文坛两颗巨星的深厚情谊——读柳宗元、刘禹锡的酬和诗》(《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林水榭《从刘禹锡与柳宗元的唱和诗看两人的交谊》(《东方丛刊》1995年第2期)等。2000年后,关于刘禹锡唱和诗的研究开始走向整体和宏观,成果如王卓华《从几部唐代唱和总集看刘禹锡的唱和诗》(《殷都学刊》2005年第4期)、付瑶《刘禹锡唱和诗研究》(新疆师范大学2005年硕士学位论文)。王文从与刘禹锡有关的九部唱和总集检讨其交往唱和的概况,付文则从刘禹锡唱和诗的编辑与流传、唱和诗的内容及体制特点诸方面进行了全面考察,从中可见逐渐拓展和深入的研究趋向。政治讽喻诗的研究成果如萧瑞峰《论刘禹锡的讽刺诗》(《杭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刘欢《刘禹锡寓言诗创作特点探析》(《西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分别对其讽刺诗的艺术风格、寓言诗的创作内容、特点及其在寓言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另如贬谪诗、咏老诗、入粤诗、咏秋诗、咏物诗等等,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这一方面反映了刘诗内容题材的丰富,另一方面,也说明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刘诗研究的细化和深化。

与刘诗研究的蓬勃局面相比,学界对刘禹锡散文的研究相对冷落。除了有关《陋室铭》、《天论》等的争议及赏析文章,专门论著不多,总计约10篇。其中,吴汝煜《论刘禹锡的散文》(《唐代文学论丛》第七辑1986年)、唐骥《刘禹锡散文略论》(《宁夏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颇具代表性。吴文从刘禹锡在唐代古文运动中的地位、散文成就、渊源和影响三个方面展开论述,较为全面。唐文认为:刘禹锡散文多作于被贬时期,表现了他被贬后的痛苦、愤懑,尤其

是不屈的精神;其艺术性主要表现为富有激情、借古讽今、妙婉幽远;语言运用骈句占了相当的比重,对秦汉散文语言有所借鉴。另外,近两年有些学位论文开始关注这一领域,如赵金《刘禹锡论说文综论》(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崔桂萍《刘禹锡论说文研究》(江西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即是这方面较新的成果。

刘禹锡有九篇赋存世,但研究成果亦寥寥。仅刘梦初《刘禹锡与柳宗元赋体文学比较》(《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毕熙燕《析刘禹锡〈砥石赋〉》(《名作欣赏》1989年第1期)、《楚辞思想与刘禹锡〈望赋〉丛考》(《重庆工学院学报》2007年第9期)几篇。另外,刘梦初《刘禹锡对屈赋的接受》(《唐都学刊》2004年第1期)一文谈到了刘禹锡《砥石赋》、《何卜赋》、《楚望赋》、《谪九年赋》等对屈赋的模拟和学习。可见,这方面还有进一步开拓的必要。

综上所述,经过百余年的探索,刘禹锡的研究卓有成效,在思想及创作等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以上世纪80年代前后为界,可以看出刘禹锡研究颇有差异的两种态势:此前,研究方向较为单一,范围较为狭窄,且受政治干扰,误入歧途;此后,研究态势日趋繁盛、视角日益多样,深度和广度均获得大的拓展。当然,不足之处也还不少。如过多集中于诗歌研究,而对散文和赋则较少关注;即就诗歌而言,对其语言、立意、结构、意象等文艺学方面的研究也相对薄弱。此外,对刘禹锡身处逆境仍能傲视忧患、行健不息的独特人格范型,更需要多角度、深层级的探索和解会;至于涉及宗教、思想、社会政治理念乃至医学、书法等方面的问题,亦需结合历史文化美学等多学科知识进行综合探讨。由此看来,刘禹锡研究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要产出更多的突破性成果,还有待研究者的不懈努力。

[审稿、责编:陈松柏]

社会心理变迁与文学走向:中国 16—18 世纪

社会心理变迁与白话短篇小说之兴衰

聂付生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王言锋博士的专著《社会心理变迁与文学走向:中国 16—18 世纪社会心理变迁与白话短篇小说之兴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是从社会心理角度切入阐述中国白话短篇小说兴衰的一部成功之作。

正如王著所说:“社会心理的变动必然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引起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变化。”王著即以此立论,将中国 16 至 18 世纪的白话短篇小说发展分为兴起、繁荣和衰落三个阶段,并就三个阶段的社会心理和白话短篇小说之间的有机联系做了详尽的论析。王著认为,从明中叶商业经济的发展、新的社会思潮的兴起和市民的扩大,到晚明繁荣与危机并存的社会状况,再到清初的动荡、清中叶的文化高压,每一个时期的社会现实都引起了社会心理的极大变化,形成了鲜明的心理特征,而每一次变化也都影响了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作者通过细致严密的分析和材料的合理运用,有条不紊而又令人信服地阐释了明中叶至清中叶二百年间白话短篇小说的发展脉络和兴衰动因。如阐述“兴起”阶段的白话短篇小说时,王著主要抓住中国 16 世纪社会转型时期影响或制约着阅读白话短篇小说的市民,深入而细致地梳理和论析市民的社会地位转变、生活方式、社会风气、消费观念等因素与中国白话短篇小说兴起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市井中那种只是一味地纵酒、淫乐、闲逛、宴饮、斗鸡、走狗的追求纯感官享受的、低级趣味的娱乐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娱乐心理需求,人们开始寻找和倾向于文化娱乐的消费”^{①P49}

的结论。我认为,这种建立在充分的文献基础之上的结论是经得起检验的,尽管我们在白话小说中很难找出与这些文献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这个时代的心理。”(《艺术心理学》)中国的 16 世纪正是市民兴起的时代,市民文化是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深受市民文化影响的文人,无论是市民审美趣味的培养还是文人创作观念的转变都与当时那个社会的文化背景分不开。也就是说,文人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是与整个的社会文化心理紧密相联的。王著即在这两者之间试图展开很有价值的理论探讨。王著论述的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也应作如是观。

因为有了正确的视角,自然对中国 16 至 18 世纪的白话短篇小说的研究也有新颖的论述。这是王著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正如著者所述,市民的社会心理和审美趣味左右着文人的创作走向,因此,白话短篇小说文体的市民性在白话短篇小说的题材、主题、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得到充分的体现。相应,到了传统思想回归的清代中叶,因白话短篇小说中教化思想的泛滥而使白话短篇小说的发展终于走进了一条让读者期待视界落空的死胡同。这其中的原因既有社会心理期许的失落,也有白话短篇小说文体本身的缺陷。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聂付生,文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研究)